

自然导向的强烈诉求： 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纳桑尼尔·霍桑

——以其三篇短篇小说为例

蒙雪琴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成都 610101)

摘要:19 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桑尼尔·霍桑在现代社会伊始之期,形象地、寓言般地从不视角展现了人与自然是统一整体的观念。他的三篇短篇小说《通天铁路》、《胎记》及《拉帕奇尼的女儿》,揭示了人主体性的过度扩张,对自然无所顾忌地加以掌控、掠夺、改造而造成的生态危机、生存危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如此探索,艺术地表现了作者自然导向的强烈诉求,极大程度地与 20 世纪深层生态学的精神实质相契合。

关键词:纳桑尼尔·霍桑;生态批评;自然导向;人类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6-0105-06

西方国家自启蒙运动始,到 19 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运动兴盛之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思想意识上,欧洲启蒙学者有关未来社会的哲理设计鼓舞着人努力争取个人自由,获得个性解放,社会生产力也由此而得到显著提高。进步的生产工具不但给人类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为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大大地延伸了人的肌体,使人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意识与能动性,促进了人们工具创新的热情与掌控自然的信心。虽然浪漫主义是 18 世纪启蒙运动对理性过分强调的反叛,但浪漫派追求的个性自由、主体解放又是对启蒙理性的继承与发扬^{[1]187}。美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拉尔夫·爱默生《自助》中的名言是这一精神的形象体现,表现出当时的人在此种精神的激励下对个性发展的无限渴求:“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只要对你心灵来说是真实的,对所有其他人也是真实的——这即是天才……抛开所有的束缚,回归你的自我,你将是世界的主人。”^{[2]1542-1544}这实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理性膜拜。

对于这样重要的历史转折期,艺术家、思想家、哲学家们必然会作出反应,思考着这样的社会变革对人类的影响,

反思着现代性,探索着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人类的生存状况等。卢梭、黑格尔、马克思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奠定了历史对那一时期的批判、对现代性的批判。美国作家拉尔夫·爱默生、亨利·梭罗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颇受评论家的好评,认为他们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为当今的生态学研究、生态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础^①。相比之下,与他们俩生活在同一时期而且同样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纳桑尼尔·霍桑对生态方面的关注得到的评论界的关注甚少。甚至,在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的语境下,从他塑造的一系列的恶魔般的科学家形象,从他对自然、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的或明或隐的涉及,有论者或认为由于霍桑受清教思想的束缚,观点保守而否定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或认为他的探索表现出他对新时期新思想及科学技术巨大威力等的迷茫与矛盾心理^{[3]72-73[4]}。但联系 20 世纪生态批评理论,我们认为,霍桑作品的如此描述表现的是他在变革面前的深刻生态意识。本文以其三篇短篇小说《通天铁

收稿日期:2012-05-2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项目“纳桑尼尔·霍桑的影响力研究”(编号:01XWW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蒙雪琴(1958—),女,四川西昌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西方文论和文化。

路》、《胎记》及《拉帕奇尼的女儿》为例,探讨纳桑尼尔·霍桑在现代社会伊始,用他那些形象的故事寓言般地从不同视角展现了他异常敏锐的目光,表明他非常清醒地看到在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被割裂,人失去了在自然中的自在感与家园感,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表现了他对人类必须重新认识自然及自己文化体系的强烈诉求,表达了他对环境危机实质的认识及克服前景的认识。

生态批评的奠基人物之一 C. 格罗特费尔蒂给生态批评如此下定义:“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带着以大地为中心的观点进行文学研究。”^{[5]XVIII}换句话说,生态批评家关注人与环境关系的现实,坚持对自然的伦理立场。他们认为,人类与自然世界是一个整体,对自然承担着责任和义务。至于生态批评兴起的紧迫原因,格罗特费尔蒂如此阐述:“我们十分不安地意识到已经处于环境末日的时代,人类行为造成的后果正在毁坏这个星球最基本的生命维持体系。”^{[5]VIII}在生态批评家们看来,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不健康的、被误导的,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6]27}。如此,生态批评的任务主要是通过提倡一种“自然导向的文学”,“重新估价自然”。这种文学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和方法的必要纠正”^[7],它将地球的有限性置于优先地位,追问在此框架内何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是可想象的和可能的^{[8]2}。因此,生态批评“是对生态危机文化根源最为全面、最为深刻的文化诊断尝试”^[9]。

一 对理性不断扩张的反思

生态批评家们认为,首先当反思的是西方历史与认识论中的二元对立论: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肉体、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生态批评的兴起意味着人们意识到了这种二元论、对立论的弊端——主体蔑视客体、文化反对自然、精神抵制肉体,意识到人类理性的无限扩张、征服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自启蒙时代始,为推翻上帝的统治,追求“我思故我在”的认知理性日益与科学技术联姻,形成了与认知理性相互联系并行发展的工具理性。于是,在消除上帝统治人的神话的同时,在打碎封建专制枷锁的同时,理性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而逐渐成为万物的主宰,开始制造人控制自然的神话。另一方面,人们相信,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的结果必然给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并且会导致人的完善和最终解放。这样,工具(或科技)理性就成为检验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知识、科技几乎就是“进步”的同义词。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10]第一卷}的名言代表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几百年里对人定胜天的信心。

霍桑的许多作品正戏剧性地演绎这种精神的虚妄,是对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的隐喻式的审视与批判,批判这种二元对立文化对人类主体的无限张扬而造成的对自然的压抑、掠夺与毁灭。《胎记》中的艾尔默、《拉帕奇尼的女儿》中的拉帕奇尼医生、《通天铁路》中以畅捷先生为代表的现代人,都是在情与智的分裂中过着悲剧性生活的人物。他们在理性的膨胀中,唱着向自然猛进的高歌,把自然的极限推到极致,把凡人的美好生活遗忘在(或者说毁坏在)对理想的无限追求之中,毁坏在对大自然的不断征服之中。如《胎记》开篇即记录了那些年代膨胀的理性怎样冲昏了人们的头脑,怎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自然的态度,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那时期,“当电及其它大自然的奥秘刚被发现,仿佛打开了进入奇异世界的条条途径,人们热爱科学,那份深情与专注甚至可以胜过对女人的爱的现象并不少见。超群的智力,想象力,精神,甚至感情,都能从各种科学探索中找到相宜的养料。这些探索,正如一些热诚献身者所信,将把强有力的智慧步步提高,直到科学家找到创造力的秘密,并可能为自己创造出新天新地”^{[11]891}(按:此条引文文字略有改动,后同)。

艾尔默受这种精神的感召,“毫无保留地致力于科学研究,任何别的激情都不能使他放弃自己的追求”,甚至于他对他妻子的爱“也只有与对科学的爱互相交织,并且把科学的力量与它自己的力量相结合,才显得更为强烈”,虽然他在各门自然科学都已作出了显赫的成绩,享有盛名,然而,他却总是为悲哀所累,因“若与他理想的目标相比,最辉煌的成就也几乎只能算做失败”^{[11]891}。他生活在一次次的与自然的斗争中,他的精神永不满足,永在高攀,每时每刻都向往着超越眼前的一瞬。他鼓吹说他配制的长生不老药,其“剂量可以决定服用者是苟延多年再死,还是立刻完蛋。没有哪个戒备森严的国王能保住性命,如果我在自己私人实验室里决定,为了成千上万人的幸福,应该剥夺他的性命的话”^{[11]902}。这完全就是上帝的形象,形象地展现了艾尔默怎样在认识和改造自然客体的同时,主体不断地得到了“自我实现”,而在实现的过程中,主体意识又不断地膨胀。他在一次次的对自然的征服、改造中,看到了他自己的力量,看到了人的力量,看到了主体对自然客体的“绝对力量”,人最终以自己的一切需要与想象做衡量,发展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帝国。因此,尽管妻子乔治亚娜已经很美,几乎是完美的化身,可他不能容忍她脸上的那胎记,认为那是自然的瑕疵,是自然打上的烙印。因此,看着胎记时隐时现地出现在他妻子的脸上,他就越来越心情不安,越来越被必须征服它的欲望所控制,以至于婚姻的幸福都被破坏了,把本来是夫妻俩的愉快时刻都变成了对那胎记痛恨的时刻,决意要除掉它的时刻。这样的愿望、这样的决心在他心里越来越膨胀,以至于不但是

他心里的一大隐患，也是他妻子心里的一大隐患，她希望他能用他的无比强大的创造能力除掉它。她恳求他道：“我不知道除掉这块不吉利的胎记要咱俩付出多大代价。说不定去掉它会留下无法治愈的残疾，也可能此印记深透到生命本身。再说一遍，我们是否知道有办法不惜一切代价除掉这只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紧紧抓住了我的小手？……你学问渊博，世人皆知。你已创造了那么多奇迹，难道连这么一块小小的小小的印记都除不掉么？”^{[11]896}

我们知道，小说的结局是，那胎记是生命的标志，可受工具理性完全控制的艾尔默已停不下来，他胜利地除去了那胎记，可乔治亚娜也死了。

二 对家园惨遭破坏的忧思

艾尔默夫妇的故事形象地展现了人怎样在对自然的一次又一次的征服、改造胜利中越来越拔高了自己的主体性、能动性，而忘却了自然的极限、自然规律的深刻教训，也是人类违背自然规律而被自然报复的表征，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惨遭破坏的表征。我们知道，各国文化都有把自然比作母亲的传统，女性的孕育功能与自然的造化功能有惊人的相似，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他们，自然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因此，艾尔默不顾后果地对乔治亚娜的改造也可解读为自然母亲被人类不顾及自然承受力地加以掌控、肆虐而最后将之彻底毁坏的悲惨结局。对这样的悲剧，《胎记》中描述说，是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家的情形，再到皇家学会记载的十七八世纪科学家的情形，他们“都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却又都具有那个时代的某些轻信，所以人们认为，或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从对大自然的探索中获得了超自然的神力，并从物理学的探索中获得了支配精神世界的力量。那一卷卷皇家学会的早期学报也同样离奇古怪，充满想象。会员们对自然可能性的极限几乎毫无了解，不停地在记录奇迹，或提出创造奇迹的方法”^{[11]903}。这揭示出了我们今天生态意识中熟悉的批评话语：人类无尽地发挥着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顾自然的极限，创造出了堪称辉煌的人类文明，可人类在享受文明的同时，也在承受着此文明带来的生态灾难、家园惨遭破坏的悲痛。《通天铁路》中也处处是这样的教训：人类为了自己的“需要”破坏了人与自然的整体结构与和谐的秩序，由此，环境问题、生态危机便向人类发难。

故事借用17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约翰·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的故事情节，讲述“我”某夜梦见像《天路历程》中的主人公基督徒那样去朝圣，只是他的朝圣方式不是像基督徒那样徒步旅行，而是坐火车。他要坐火车从“毁灭城”去“天城”。坐着这方便快捷的火车，一路上再不像基督徒当年那样肩扛重物，非常轻松，享尽了机械文明带来

的便利。虽然从根本上来说，小说有它的宗教主题，但在这样的宗教话语中，作者也同时展现了他对人类在其科学“进步”过程中取得的如此“进步”的疑虑，是对这些进步在多大程度上赋予了生活以新的价值和意义的质疑。那一路上的工业文明污染是“进步”与“便利”的代价，剥夺了人的生活意义，割断了文明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使生态的污染成了人的生存境况，人失去了自己与自然和谐与其的美好家园。

从那人满为患，被臭水潭包围着的发达的“毁灭城”开始便是触目惊心的一幅幅生态危机图，“即使大地上所有阴沟臭水尽排在那里，也不会如此地刺眼又刺鼻”，这就是有名的“伤心潭”^{[11]945}。再看那机车，冒着浓烟烈火，把自己连同驾驶员全裹在浓烟烈焰之中。一路上向路人喷射烟雾和烈火，将他们包裹在烫人的水汽里。此外，它的汽笛声是“尖利刺耳的鸣叫，就像成千鬼怪撕心裂肺一齐发喊”^{[11]951}。路上，每到一站，它都会发出这种刺耳的长鸣。车到终点站后的最后一声凄厉长鸣最为可怕，让人从“长鸣声中似听得出形形色色哀泣与嚎叫，雷霆之怒与魔鬼或疯子的狂笑。……造出一种地狱般的喧嚣，不但惊扰了伯拉居民的安宁，简直把噪音直送进天国之门”^{[11]961}。

整个死阴谷里烟雾漫漫，弥漫着易燃硫磺，被无边的毒气与黑暗包围着，没有一束阳光能穿透。只好沿途点燃四排气灯。可那光刺眼眩目，仿佛是“路轨两旁筑起了两道火墙”，令人难受之极。山谷中的地狱入口同样阴沉黑暗，有毒气体把人弄得麻木迟钝。这里是铁路董事会的钢铁生产基地，同时又能给机车提供所需的大量燃料，这里山口不停地喷出巨大的暗红色火舌，狂风刮出可怕的低语、尖利呼啸深沉颤抖的飒飒声。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全是不招人喜欢的模样，他们的皮肤被烟熏得黑黑的，畸形的身体，怪状的双脚，眼中闪着暗红色的光，仿佛心儿在燃烧，火便从上面的小窗洞喷出来了。还有件怪事令人吃惊，炉前干活和给机车添料的人，每回喘口气，必从鼻子和嘴里喷出烟来”^{[11]951}。

这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景象披露了与工业文明、科技理性发展相伴的严重的生态环境的污染、生态美景的消失。一个又一个的工业奇迹、科技奇迹，确实表现出了人非凡的创造能力，但这些奇迹让人类付出的代价是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美景的消失，人与自然环境在人类尽享自己主体扩张的同时变得势不两立，人类生活不仅失去了任何美的资质，而且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摧残。从今天世界各地很多因为环境的污染导致生活在那些地方的人与动物都遭受严重影响的报道，我们可见霍桑对生态危机的洞察之深刻。如此，《通天铁路》用审美的方式向人警示的是，这样疯狂的科学技术发展旅程通向的不是“天城”而是“地狱”。

在《拉帕奇尼的女儿》里，那科学家利用科学创造出的

花园的繁茂美丽,可与上帝制造的伊甸园媲美,但在伊甸园里,人类祖先尽享劳动的快乐,与自然融为一体,生活其乐融融,而在拉帕奇尼的园子里,尽管他创造了那里的一切,“对那些花草的生命了如指掌,却与它们并不亲近”。恰恰相反,他还小心翼翼地不去碰它们,也避免吸入花香。行走在园子里,他如同“走在猛兽、毒蛇、妖魔鬼怪等邪恶势力之中,稍不留心,就会横遭祸殃似的”^[12]。乔万尼·古斯康提目睹着种花人如此如临大敌的样子,不由心生恐惧,不禁自问道:“难道这园子是当今世界的伊甸园么?而这个人——对自己亲手培植的东西都唯恐身受其害——就是亚当?”^[12]霍桑的这种构思:现代亚当(创造者)把自己的家园变成了一个充满毒气的花园,以致自己在里面活动也需小心翼翼,否则就会丢掉生命,变成自己手下创造物的牺牲品;以至于他创造的生存环境完全毒害了他的女儿,使她被毒素浸透而改变了她人的本性,从而完全被异化:失去了与他人、与社会、与自我、与自然的血肉相联的天然关系。联系霍桑同时代一些思想家、艺术家对工业文明污染的痛斥,对回归自然的强烈呼唤,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态环境,霍桑的话语就并非耸人听闻,而是显示出深刻的历史意义、实际意义与当代意义。21世纪的今天,西方社会经过近300年的现代化进程,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社会物质超前地丰富,发达的科技探索领域达到了最遥远的宇宙边际,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更高级的文明阶段,可我们大家都在体验着如此发达的科技理性造成的生态危机。乔纳森·贝特在《大地之歌》中这样写道:“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却早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时代……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冻土溶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海洋过度捕捞,沙漠迅速蔓延,森林覆盖率锐减,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物种加速灭绝……我们生存在一个无法逃避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城市的空气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农业已离不开化肥和农药……而畜牧业,牲畜的饲料里竟含有能导致人中枢神经崩溃的疯牛病毒。”^{[13]24}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家园,我们在我们的家园里,能有自在的家园感吗?这种生存感觉其实并不亚于拉帕奇尼在他的园子里。

三 对生存危机的追问

何以造成如此的生存危机?如前所述,霍桑认为,人类膨胀的理性导致的对自然的无所顾忌的掠夺和压榨有难以推卸的责任,另外,霍桑还把披露的笔触指向人性、社会的经济体制、文化模式等。

《胎记》的末尾,乔治亚娜死时的临别赠语意味深长:“我可怜的艾尔默,你总是志向高远,并已取得辉煌的成就,不要因为拥有这么高尚纯洁的感情,而懊悔拒绝了尘世能给你的最好东西。”^{[11]310}乔治亚娜的话语表明,付出了

生命的惨痛教训都还未让她看清艾尔默的问题、人的问题,看清人性的弱点:人是精神与肉身的复合体,肉身有限,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的主体理性却生性好高骛远,可以比天高。并且在这科技不断进步的时代又得到了不断的扩展、无限的延伸,使人对自然的占有欲、控制欲也更加膨胀,从而更加不能接受自然、人的肉身、人的生命的有限,因此更加渴望无限地去改造、征服自然,结果把本来已很美好的东西毁于一旦,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破坏了本应与我们人类血肉相联、和我们人类是一个整体的自然,使人与自然分离。霍桑把艾尔默与他的助手阿米那达布刻画为人的此两方面。这本应水乳交融的两方面相互耻笑,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势力。阿米那达布“有巨大的力量,头发蓬乱,满面烟尘,浑身上下难以形容的粗犷纯朴……而艾尔默则身材颀长,皮肤白皙,一脸智慧”^{[11]898}。艾尔默对阿米那达布极其蔑视,斥责他是“凡夫俗子”,“只有感觉的东西”;阿米那达布对艾尔默的行为也总有不同的观点。此精神与肉体相分离的痛苦也被艾尔默记载进了自己著述之中,说明他的精神总“被泥土做成的肉体所累”,说明他充满“崇高的天性却极为苦恼地被肉体凡胎制约的绝望”,艾尔默的这种切身体会,霍桑说,“也许不论哪个领域的天才都能从艾尔默的记事录上认出自己经历的生动写照”^{[11]904}。对艾尔默的悲剧,霍桑评论道:“倘若艾尔默拥有更深刻的智慧,就无须这样抛弃自己的幸福,这幸福本可以将他性质完全相同的尘世生活与天国的生活相融。”^{[11]911}这传达出霍桑的深刻生态智慧:人类本应该接受自然给我们创造的美景,让我们的心智与其交融,成为一体。

拉帕奇尼及其女儿的美好生活也被他的统治欲、占有欲破坏殆尽。为了保住他科技上的领先地位,他变得关心科学胜过关心人类:“他关心病人仅因他们是他手中新的实验品而已。只要能给他的知识积累增添哪怕一粒芥子,他都愿牺牲人的性命,包括他自己,或者任何他最亲爱的人。”为了弥补肉身的脆弱,以能统治世界,“他亲手栽培有毒植物,据说甚至培育出了一些新品种,其毒性比天然生长的东西大得多”^[12],科学完全成了他争夺功利、争夺权力的武器。因此,为了使他的女儿也所向披靡,能有控制自己命运、控制世界的的能力,他不惜改变她的天性,使她充满毒素,使她“吐口气就能打败最强大的敌人”,使她“容貌有多美,力量就有多大”^[12]。可也就是这种控制欲,这种贪欲把他与他女儿的家园变成了毒气弥漫的园子,葬送了他与他女儿的幸福。

此外,《通天铁路》还把此种追问推向更深处:人类生活的方式、生产方式与经济、文化体系等都决定着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因此,小说中那种一切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以人自身的眼前利益为尺度的观念,就有了我们小说中那

种不顾及自然的承受力而疯狂发展的画面。人类人口的过度膨胀压抑着自然,过度地损耗着地球资源,“毁灭城外是那臭气熏天的大垃圾潭。那铁路及沿途的科技理性胜利及其相伴的严重生态后果形象地揭示了人是怎样地热衷于便利的、富于功利性的生活,只看到快速的经济带来的眼前利益而不顾及这种过度的科学主义、工业主义、重商主义带来的那一系列的资源加速损耗的问题、污染问题、生态危机问题、人类的生存危机问题。“名利城”喧嚣的商业生活最戏剧化地体现了这种文化体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人们已不愿再往“天城”,习惯于生活在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中,而更喜欢“名利城”,认为这里就是“天城”,因为这里有热闹、实惠、便捷的生活。这里,一切有形的、无形的(诸如知识、思索、个人道德、良心)全成了有价商品,全可以用数字来算计与掌控,都可以成批生产与出售,“王子、总统、诗人、将军、艺术家、演员、慈善家——全都在名利场摆摊经营”^{[11]946}。这即是说,在这样理性的工业社会中,人成了马尔库塞称的“单面人”^②,只有技术、理性与利益,而人生与自然相融的乐趣、一个人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中感受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悠然自得全被遗忘了,人生的内在价值与情感全被忘却与忽略。这样的生活方式是资源浪费型的,如:“有个年轻人,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却花上许多来购买各种疾病,最后又把剩下的钱换了一大堆忏悔,外加一套破衣衫。一个漂亮姑娘用自己最宝贵的财富——水晶般透亮的心,换来一颗宝石,可惜已磨损变旧,分文不值。”再如,“想把名利城上又小又暗十分不便的公寓租上几年,人们往往用于天城的大片地皮与金

屋高堂,以十分吃亏的价格来交换”^{[11]957}。因此,不言而喻,为了满足贪欲,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蹂躏与掠夺又将被推向新的高度,生态危机因而也会变得愈加严重。

小说中两位坚持徒步旅行去“天城”的香客的思想理念、文化模式与上面的模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只有他们到达了“天城”。他们的行动戏剧化地强化了霍桑对人类生存危机的追迫及其自然观:首先,人应像这两位香客一样限制自己的贪欲,不求生活的快捷、便利,而愿意投入更多的劳动;第二,人与自然是共荣共存的统一体,顺应自然,让自然自在,人亦自在。

因此,通过人物塑造、虚构的故事,霍桑用审美的方式传达着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忧虑,传达着他自然导向的强烈诉求,表明了他对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人对自己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的深重忧思,隐喻式地呼吁人们重新认识自然,估价自己的文化,纠正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切以人类自己为中心的偏斜。此与今天的生态智慧有着同样的取向:奈斯指出,深层生态学关注现代化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并追寻环境危机的根源,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和人性的^③。多布森在《绿色政治思想》第一章开头就反复聚焦生态主义的定义及所关注的问题,指出:生态主义从根本上置疑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期望一个不追求高增长、高科技、高消费,而以包含着更多劳动、更少闲暇、更少物品和服务需要的“美好生活”为目标的后现代社会^[14]。大卫·雷·格理芬也指出,“我们必须轻轻地走过这个世界,仅仅使用我们必须使用的东西,为我们的邻居和后代保持生态平衡”^{[15]227}。

注释:

- ①参见: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卡洛·麦茜特在书中指出,美国的浪漫主义者爱默生把荒野看作精神洞察力的源泉,梭罗发现异教徒和美国印第安人的泛灵论把岩石、池塘、山脉看成是渗透着有活力的生命的证据。这些都影响鼓舞了19世纪后期由约翰·缪尔(J. Mair)领导的环境保护运动,以及像弗里德里克·克莱门茨这样的早期生态主义者。
- ②参见:赫尔伯特·马尔库塞《单面人》,张伟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编《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88—489页。马尔库塞在其中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已蜕变成一种“单面的社会”,活动在其中的只是具有“单面思维”的“单面人”,单面人只知道物质享受而丧失精神追求,只有物欲而没有灵魂。
- ③奈斯在他1973年的文章《浅层的与深层的、长远的生态学运动:一个概要》中,首次把环境主义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浅层生态学运动和深层生态学运动。奈斯认为,浅层生态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只关心人类的利益;深层生态学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关心的是整个自然界的利益,追迫环境危机的根源,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和人性的。参见:Arne Naess: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ical Movement, A Summary”, *Inquiry* 16(Spring 1973): pp. 95-100; Arne Naess: “The Deep Ecological Movement: Some Philosophical Aspects”, *Philosophical Inquiry* 8(Fall 1986): pp. 10-31.

参考文献:

- [1]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 [2]Emerson, Ralph Waldo. Self-reliance[M]// *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1. Lexingt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94.

- [3]常耀信. 美国文学简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 [4]陈玉涓. 试析霍桑非理性的科学观[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2).
- [5]Glotfelty, Cheryll. Introduction[C]//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Edited by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Athens & Lond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 [6]Worster, Donald. *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7]Love, Glen A. Revaluing Nature: Toward an Ecological Criticism[J]. *Western America Literature*, 1990,25(6).
- [8]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M].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 [9]胡志红. 环境启示录书写:生态文学的预警工程——生态批评对环境想像的探讨[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6).
- [10]弗兰西斯·培根. 新工具[M]. 许宝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11]纳桑尼尔·霍桑. 故事集:故事与小品[M]. 姚乃强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
- [12]Hawthorne, Nathaniel. *Rappaccini's Daughter*[M]// *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1. Lexington: D. C. Heath and Company,1994.
- [13]Bate, Jonathan. *The Song of the Earth*[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 [14]安德鲁·多布森. 绿色政治思想[M]. 郇庆治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 [15]大卫·雷·格里芬. 后现代精神[M]. 王成兵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The Nature-oriented Strong Appeals: On Nathaniel Hawthorne From the Eco-critical Perspective

MENG Xue-qin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1, China)

Abstract: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American romantic writer of the 19th century, depicted the unit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a vivid and fabulous w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society. Three of his short novels, i. e., “*The Celestial Railroad*”, “*Birthmark*” and “*Rappaccini's Daughter*”, reveal the overexpansion of man's subjectivity, the eco-crisis and the existential crisis caused by man's over-control, plundering and reforming of nature. The explor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reflects the writer's nature-oriented strong appeal and fits the spirit of deep ecology of 20th century to a great extent.

Key words: Nathaniel Hawthorne; eco-criticism; nature-oriented; anthropocentrism

[责任编辑:唐 普]